

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

On Translatological Dictionaries

译学词典论

孙迎春 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www.sflep.com

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翻译学词典研究项目

On Translatological Dictionaries

译学词典论

孙迎春 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译学词典论 / 孙迎春著. —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9

(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

ISBN 978-7-5446-1458-0

I. 译… II. 孙… III. 翻译-词典-研究 IV. H059-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3918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唐小春

印 刷: 上海华文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5 字数 263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 1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46-1458-0 / H · 0594
定 价: 29.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本社调换

序

词典编撰原则：惟变所适与规约守成论

——序孙迎春教授《译学词典论》

辜正坤

90年代后的中国翻译研究界出现了一个颇值得注目的现象，这就是翻译词典、翻译学词典的产生及伴随而来的相关翻译研究，尤其是对译学词典的研究。其中的佼佼者，可推山东大学的孙迎春教授。孙教授不仅编撰了翻译类词典、翻译学词典，并且撰写了若干研究翻译词典及翻译学词典的论文。在这个基础上，他目前编撰的这部《译学词典论》可以说是一部分量很重、相当具有开创性的学术专著。这部著作以译学词典及其研究为考察对象，其涵盖内容、研究方法、术语厘定及陈述形式明显具有学术专著所特有的理论性和系统性。这样的著作不仅在国内，就是在国外，也颇具开创性，因此很值得翻译界人重视。

词典类工具书的编撰，不论对哪个学科而言，都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对词典类工具书编撰的研究论述，也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因此，在拜读了孙教授《译学词典论》并为之作序之机，我也想就词典类工具书的编撰这个课题发表一点想法。我的想法从学理上来说，植根于我从前阐述过的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原理。将同一种原理应用于词典编撰现象，也可以称为词典编撰原则多元互补论。

没有一劳永逸的词典

认清这一总的原理，有助于我们总是处于一种与时俱进、任运自

然的心态。因为我们都很清楚,译学本身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种发展状况与译学词典本身的编撰是互动互构互补互彰的。换句话说,译学词典的编撰不得不因应流变不居的译学发展状况。这样一来,我们势必承认,一切词典,无论看起来多么完善,都只可能是相对的,都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因为任何词典所收的词条总体既然都必然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断断续续地产生的,就都必然带有各个时代所赋予的局限性和矛盾性。从收词时限而言,总是存在历时性和共时性矛盾。从词典规模而言,依据不同读者层的需要,总是存在大、中、小三类规模的矛盾。从词典的释义方式而言,总是存在描写型和规范型的矛盾。在当代社会,从词典载体而言,还总是存在印刷版、电子版、网络版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各方虽然都能满足特定场合、特定条件下的特定需求,却不能满足一切场合、一切条件下的一切需求。因此,人类永远需要编撰所有能够满足各种需要的各种词典,却永远无法一劳永逸地编撰出一种能够应对所有需要的词典。

惟变所适: 描写型方法在中西词典编撰界

《易经·系辞》曰:“生生之谓易”,断言世界万物迁流衍化是一种普遍现象,并指出人类由此而来的应对方式自然就是“惟变所适”(《易经·系辞上》),即以动态策略对应大千世界的动态现象。同理,在词典编撰方法上就表现为客观、自然地反映活的语言现象。在编撰更专门的译学词典上,就表现为尽可能广采博收各类与译学相关的辞项。这样的方法,西方人谓之描写主义(Descriptivism)。描写主义在语言学界的代表可推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这一学派主张对语言现象进行尽可能客观、系统、全面的陈述,以便准确地描写出语言的客观变化。反映在词典编撰上,西方产生了描写主义的代表作品《韦氏第三版本新国际英语词典》(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Unabridged)。

《韦氏第三版足本新国际英语词典》(1961)力主对语言作客观的记录和描写,非常重视活的语言。它收罗了大量的俚语、俗语(甚至包括许多脏话)。它的引用语涉及 14,000 多作者,例证达 20 余万条,其来源却主要是 20 世纪中期的著述。词典的编者戈夫博士(Philip B. Gove)信奉描写语言学派宗旨,认为词典编撰应该是忠实记录性的、描述性的,而不是规定性的。编撰者不应去纠缠正确与不正确、好与坏之类人为的概念。显然,戈夫博士的这种做法,是对西方传统的规范主义词典编撰原则一次革命性反叛。它的产生,在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影响极为深远。这不只是一种学术方法,实质上是民主、自由、客观等政治观、价值观、哲学观在学术领域内的折射。这样一种方法对于西方学术界来说,确实具有颇大的进步意义,它使上千年来占垄断地位的规范主义词典编撰方法受到极大的冲击,使之暴露出固有的缺陷。

然而,描写主义这个术语虽然产生在 20 世纪的欧美,其基本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却早在 2000 年前的中国古代社会就已经产生,并在实践中有相当多的应用。换句话说,作为一种方法,中西方学者都曾使用过,而中国学者使用得更早。例如只从对方言的客观记录、比较、分析研究而言,我们就可以举出西汉扬雄(公元前 53—公元 18 年)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为例。扬雄的《方言》是世界上最早的方言词典,为了撰写这部词典,他花了 27 年工夫!扬雄的方法主要是对语言现象的静态记录、描写,他的方言调查方法无疑也是一种描写语言学方法,虽然在语音方面陈述不多,对语言整体风貌的描述不够系统,但其基本方法与现代描写主义方法在精神上非常相通。有人因为其方法与现代描写主义相比不够系统、全面、深入而试图抹煞其描写性意义,这是不对的。这就正如古代的印刷术、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制造法与现当代五花八门的更为高超、

精妙的印刷术、指南针、造纸术、炸药制造术等相比,无论多么简陋,却不应疏忽、贬低其原创意义一样。逻辑上说来,现代人的方法和理论承继了前人,应该比前人创造的东西更精妙、系统才是正常的。如果现代人创造的东西还和 2000 多年以前的人创造的东西一样粗疏,那只能证明现代人是何等的低能。另一位晋代大学者郭璞(276~324)对扬雄的《方言》进行了注释,他的注释方法其实也是一种描写语言学方法。为了解释清楚扬雄的《方言》,郭璞列举了许多他所处时代的晋代方言这种活语言材料来做注释。他这种利用活语言材料的方法,也为后来的许多中国语言学家所应用。例如元周德清(1277-1365)的《中原音韵》就基本上反映了元代大都语音情况;清初樊腾凤(1601-1664 年)的《五方元音》就以相当的规模记录了 17 世纪北京的语音系统;而清乾隆年间人黄谦的《汇音妙语》(1800)就令人惊异地记录了 18 世纪福建泉州的语音系统。至于中国现代语言学在描写主义方面的成就,则不能不提到民国时期的赵元任先生。赵元任在撰写《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 年)时,显然已经受到了西方描写方言学的影响。赵元任对各地吴语语音的描写所达到的精微程度,据说比之同时代的国外描写语言学还要更胜一筹。但是专家们同时指出,中国的描写方言学尽管从远古时期起就有描写的特征,却从来不是纯粹的描写方言学。中国文化本身是综合性的,往往各门学科知识和各类学科的方法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不像西方文化系统中的各门学科那样有非常明晰的界限。因此,体现在词典编撰中,描写方法和其他方法,例如规范方法,总是不同程度地纠结、融合在一起。这样一种特点,有的人看作缺点,在我看来,实际上是一种优点。就人们广泛争论的描写主义与规范主义两种方法的矛盾而言,中国文化内在的这种优点恰恰能够把这种矛盾巧妙地消弭于无形,使得两种方法的利能够得到合理彰扬,而其弊能够得到适当地抵消。

变中求不变：规范型方法劫后重生

描写型方法在西方词典编撰界走红,使人们重新反思传统规范型方法的缺陷。由于西方学术界的主流思维模式历来是非此即彼的排中律占上风,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描写型方法似乎占了压倒性优势,规范型方法受到重创,至少在学术理念上是如此。但是,反思规范型缺陷的同时,也引起另外一批学人反思描写型方法的缺陷。这集中体现在对《韦氏第三版足本新国际英语词典》弊端的指责上。归纳起来,这些反对意见至少有下列几点特别值得批评界注意:

1. 所有语词虽然分为标准用语和非标准用语,但何为较为规范的标准语却并无标记。
2. 许多俚语亦被视为标准语,但其实它们很难用于正式场合。
3. 大量删掉古代词汇或所谓陈旧词汇(估计删掉了约 20 万陈旧语词和历史语词),这势必为读者阅读古代文献带来障碍。
4. 由于注重描写性,因此对语音的标注过分繁琐。而究竟什么语音相对更为通行,词典又故意不予明示,使得读者难以择善而从。

诚然,描写型方法强调客观性,强调削弱编者对客观语言现象的干预权,这的确有助于向人们更清楚地展示语言的本来面目,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词典是一种工具书,其功能是多方面的。它不是只供少数专家学者使用的专门著述,而是面对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的普通工具。词典这个词的语义本身就预设了一种权威性、定义性、规定性和指导性。千千万万的普通读者并非语言学专家,并非能够轻而易举地从专家们设计的描写性学术眼光来看待并使用词典,并非能够完全无视传统对于词典本身的语义预设。恰恰相反,普通读者是在文化传统链条中来接受词典的,因此他们中绝大多数的人更容易习惯性地预期手里的词典具备应该有的权威

性、定义性、规定性和指导性。而现在实际上,在纯粹描写性词典中,除了客观性的语言现象罗列之外,他们很难得到指导性或忠告性的意见。他们只好囫囵吞枣地消化掉这些语言现象。词典编者不希望读者受到编者有可能产生的语言偏见的影响,从而尽可能遏制编者的主观性,这带来了客观性的好处,却同时牺牲掉了编者的主观性可能给读者带来的另一种好处。我们不应该忘记一个起码的事实:和千千万万的普通读者相比,词典编者尽管可能有不值得鼓励的语言偏好,但是他们的语言实际应用能力和对语言美本身的判断能力,至少在一般场合,应该是值得普通读者仿效的。这就为词典本身的规范性提供了可行性基础。换句话说,词典对语义的选择可以并且应该具有指导性功能。词典的编者可以适当地让词典发挥出一定的规范作用。孙迎春教授在他的这本《译学词典论》中提到理论“亦可、亦应发挥其前瞻性功能,为而后的实践提供超前性指导。”其实,这种思想对于词典编撰,例如译学词典的编撰,也可以说是同样适用的。

不错,语言现象是会随着时空条件而千变万化的,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词典编撰采用与时俱进、惟变所适的态度是可以的,但是,我们更应该记住的是:变中还应有不不变。变诚然是绝对的,不变诚然是相对的。但是在语言问题上,人们最容易把握得住的,恰恰是相对不变的成分。对人们最有应用价值的,也恰恰是相对不变的成分。虽然所有的相对不变成分,将来或在别的场合都可能发生新的流变,但是在目前,或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内,它是不变的,我们就要大胆地把它看作不变成分来处理、来应用。至于将来它们会如何变,那是将来特定时间段的事情,那时我们自会根据将来的特定条件来加以新的规定。如果因为考虑到它们在将来或在特定场合的可变性,从而不敢把握它们当下的不变性,完全不给予它们此时应有的规定性,则是错误的,起码是不明智的。描写型词典的缺陷可能是灾难性的。它虽然给现象留下了尽可能大的发展空间,但是也种下了最终颠覆

词典本身、乃至颠覆词典内容、词典的基本功能本身的祸根。

因此,变中求不变。规定性方法应该像描写性方法一样重要,有时甚至更重要。

假如秦始皇时代不出现李斯等统一文字的规范性行为,假如没有许慎的《说文》等规范性语文典籍,没有统一文字的中国到现在肯定是四分五裂的!假如英国 1755 年以来,没有塞缪尔·约翰逊的《英语词典》这类的规范性语言典籍厘定英语拼写、发音与语义方面乱七八糟的状况,英语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国际地位,很可能泛化衍变成了好多种语言!语言文字的统一和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规范性具有强迫性、控制性特点,也具有强效性、聚合性特点。二者都是人类需要的。

应变是必要的。惟变所适是词典编撰者们应该采取的整体的、长期的抽象战略。

不变也是必要的。守成与规范是词典编撰者们应该采取的有针对性的、短期的、局部的具体战略。

词典编撰原则多元互补论

惟变所适与规约守成表面上是矛盾的,其实是互补的。宜变则变,不宜变则不变。事物的发展总是变与不变这两种状态的有机构成。我们知道大千世界的一切事物在一切时空范围内都在不同程度地发生变化,但是具体的事物实际显现在我们面前时,总是呈现出相对的稳定性。我们能够捕捉到的,也恰恰是这些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状态,没有这种相对稳定性的状态,我们所面对的就是稍纵即逝的无常世界,那么一切不可得,一切就真如佛家所言处于空的状态了。偏空偏有均非中道。变与不变,连环互进,这是事物发展的真相。至少在我们所能够理解的这个客观世界中,事物的变与不变,相对说来,

还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临界值。一个事物达到某一临界值，非变不可；一个事物没有达到某一临界值时，亦呈现出相对的稳定性。

在这样的哲理性思考下，关于词典编撰的原则问题，我们就势所必然地会得出词典编撰原则多元互补论。

所谓词典编撰原则多元互补论，指的是在进行词典编撰时，由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或国家、不同的目的、不同的服务对象、不同的词典类型、不同的词典所涉内容的发展现状……，而有不同的词典编撰原则。在特定的时期内，某种原则或某些原则可以被强调，成为主原则，但是当情况发生变化时，另一个原则或另一些原则又可以上升为主原则并与其余不被强调的原则相辅相成，构成一个有机的词典编撰原则系统。

以译学词典编撰为例。在涉及如何协调描写性方法与规范性方法时，根据词典编撰原则多元互补论原理，我们可以有以下诸种可能的原则：

1. 当译学总体还属于初创期或初创后期时，虽在若干方面趋近成熟，但在许多方面，例如理论力度和相关术语还不太成熟时，译学词典的编撰似宜采用描写性和规范性两种方法并行但描写性方法更被注重这种原则。在具体施行时，可放宽所收译学辞项范围，以便为研究者和一般读者提供尽可能大的学术借鉴视野。同时，对某些公认度较强的辞项，亦可适当加以标注。
2. 当译学总体属于发展盛期时，在许多方面译学已经成熟，译学词典的编撰似宜采用规范性和描写性两种方法并行但规范性方法更被注重这种原则。在具体施行时，编撰者可能会面临辞项过分庞杂的局面，因此应相对收敛所收译学辞项范围，对许多貌异而质同的术语进行归类、并合，使之更凝练精粹，以便为研究者和读者适当缩小漫无边际的学术借鉴视野，节约他们的学术检索时

间,提高其检索效率。同时,对新产生的原创性译学义项,仍宜坚持描写性原则,以便防止它们被这个时期势所必然的学术霸权意识所湮灭。

3. 在同一个时期内,翻译现象或译学现象成熟与否是参差不齐的。一般说来,对比较成熟的译学现象,在编撰时以规范性原则为主;对处于初创时的译学现象,则宜以描写性原则为主。

在涉及如何协调不同的地区或国家时,根据词典编撰原则多元互补论原理,我们又可以有以下诸种可能的原则:

1. 在译学初创期,宜采用中外译学辞项尽可能兼收并蓄、但适当放宽本土译学辞项范围的原则。
2. 在译学趋近成熟期,仍宜采用中外译学辞项兼收并蓄、但适当收敛、凝缩外来译学辞项范围的原则。
3. 在译学盛期,虽仍然可用中外译学辞项兼收并蓄的原则,但是有意识地体系化、凝聚化本土译学辞项系统,亦可以成为一些译学词典的编撰原则。
4. 与此同时,完全采用单一的描写性方法、试图囊括所有译学现象的译学词典和完全采用单一的规范性方法、试图格式化所有译学现象的译学词典也应该分头有人来编撰。两种全然相反的词典并存于世,是学术世界的学术兴旺发达的标志。

同样的道理,依据不同的目的、不同的服务对象、不同的词典类型……等而设定不同的编撰原则,我们可以演绎出更多的可操作性的编撰原则。读者可以举一反三地将它们演绎出来。有人也许会担忧,这是不是会产生无穷的词典,以至于到最后根本无法编撰词典呢?实际上这种担忧是完全多余的。就正如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并不会使世界上的作品都产生无穷无尽的译本一样。世界本身是无限的,但人所能接触的世界归根结底是有限的,人能够依据理论来进行实践的规模也是有限的。具体到译学词典编撰这个特定领域,编撰

者势所必然地会考虑到读者市场、学术影响力、个人的理想追求等多种因素,而不得不选择有限的编撰原则。学术世界的淘汰原则也会制约着词典的编撰,不会使之过度泛滥。世界是丰富多彩的,词典的编撰形式、方法、内容、规模也应该是丰富多彩的。每一种原则都会给予我们某种需要的东西,许许多多的词典类型会从不同角度满足我们这样或那样的需求,这就是词典编撰原则多元互补论的基本原理,也是译学词典编撰原则多元互补论的基本原理。

笔者的上述观点,是在阅读了孙迎春教授的著作后产生的一些联想,挂一漏万,目的只在于抛砖引玉,以期引起更多的学者涉足这个相对冷僻的领域。好在孙迎春教授的专门著述为我们开启了一扇洞见此领域的门窗,我能先睹为快,实为幸事。

是为序。

2008年9月5日于北大世界文学研究所

前言

词典具有极为重要的社会功能,它记录着各个时代五花八门的社会知识。在上世纪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这个地理、人口大国曾经是个词典小国。“法国著名词典学家阿兰·雷伊说:‘现代文明是词典的文明。’从信息对现代社会的作用以及词典作为传递信息的重要工具来看,这话不难理解。”^①在信息社会里,词典的重要性凸显,在某些发达国家,词典在出版物总量中竟占了20%以上的份额^②,于是有了词典文化一说。文革以后,经过“20年左右的光阴,中国已完全摆脱了辞书编纂、出版的落后状况,无论在实践方面还是在理论方面,都已跃居为世界上的辞书大国。”^③词典是语言文字发展到相当成熟阶段应运而生的产物,虽然人类社会在历史上有过漫长的无词典时期,但历史的车轮行进到今天,任何一个文明的国度,如果缺了词典,简直无法想象会遇到多么大的困难。

那么,是否可以说,一个学科,如果没有一套覆盖整个学科的词典,这个学科就还不够成熟。或者说还不够完整,欠缺对于研究的研究,欠缺梳理归纳。这里所说的第一个研究,就译学领域而言,指针对翻译实践的理论探讨;第二个研究,指对理论探讨的梳理归纳,结果之一是译学词典。其实,还有第三个研究,那就是对于各种译学词典的研究,由编入研,进入形而上领域。

“译界缺乏译学词典意识,计有4条原因:1.译学词典诞生的时

① 张春新:提高词典评论的理论水平——《词谏》读后有感。辞书研究,2002(2)。

② 黄建华:词典论。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③ 同上,“修订版小序”。

间不长,人们对它的认识须有一个过程;2. 译学词典自身还有缺点,需要完善;数量不多,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译学词典体系;3. 研究译学词典的文章太少,专著尚无,还没有开辟出一个译学词典学领域;4. 人们习惯了久已形成的研究方式,意识不到或不相信译学词典可有助于翻译研究。”^①这是笔者6年前针对当时的情况所说的一番话,用于观察今天的态势,已是有些过时。

2002至2008这七年我们召开了四次研讨会:“全国翻译学词典暨译学理论研讨会”(2002,烟台);“2004全国翻译学词典暨译学理论研讨会”(2004,威海);“第三届全国翻译学词典暨译学理论研讨会”(2005,上海);“第四届全国翻译学词典暨译学理论研讨会”(2007,大连)。而且,2008年8月在上海召开的第十八届世界翻译大会把“术语研究与翻译学词典研究”列为第九个主要议题。这些都表明译典研究正在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多次研讨会的召开,在全国形成了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译学词典有所了解。随着四次会议的召开,正式出版了五部文集和两部专著,除会议文集外,还出版了一部《翻译学词典博士文集》,内含两篇博士学位论文和几篇博士生论文。两部专著,分别是《翻译学词典编纂之理论研究》(曾东京,2007)和本书。加上《山东外语教学》、《中国翻译》、《外语与外语教学》、《辞书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上海翻译》、《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临沂师范学院学报》、《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跨文化交流》等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译学词典文章和数篇硕士论文,我们已经有了—批可观的成果。译学词典也增加了几个品种,如《译学词典》(方梦之,2004)、《翻译研究关键词》(孙艺风,仲伟合,2004)、*A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Technology* (Chan Sin-wai, 2004)、《史氏汉英翻译大词典》(史企曾,2006)、《语言类核心期刊译

① 孙迎春:论译学词典的描写性。《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9)。

学论文索引》(孙迎春、刘新芳,2006)、《汉英对照翻译学论说》(孙迎春,2007)等。每隔一年召开一次翻译学词典暨译学理论研讨会的机制,为翻译学词典编撰与研究领域的开拓提供了很好的保障。

本书意在以译学词典及其研究为考察对象,撰写一部以理论探讨为主的作品,为译学词典学的建立贡献一砖之力。所论内容,涉及译学词典编纂与研究的各个方面,诸如译学词典的性质、对象、功用、类型、编纂原则、宏观结构、微观结构、学科定位、编研结构、过程与行为、价值与评价、译典方法论等。

因为译学词典是专科词典的一种,所以属于专科词典共性的东西,也必然存在于译学词典。译典研究的历史虽然不长,但许多专科词典乃至语文词典、双语词典、百科全书、实用手册等工具书的编纂及其研究成果都可提供有益的借鉴。从人类编出第一部词典到学者写出第一篇研究词典的学术论文,其间经过了数千年的时间。人类在历史上总是这样,实践先行,只要产生了效果,就不急着去进行学术研究,因为学术研究具有全面性、深刻性、科学性和系统性等特点,需要高素质的人在必要的条件下进行。

人类文明已经发展了几千年,各学科互促并进,所以从第一批有影响的译学词典问世,到第一篇译典论文揭开面纱,再到今天的初具规模,只不过经历了短短4—9年的时间。这是人类善于学习的天性所带来的成果。虽然总体而言仍是实践先行,学术随后,但就某些方面某种程度来说,理论亦可、亦应发挥其前瞻性功能,为而后的实践提供超前性指导以避免许多弯路和不必要的重复,实现高效快速的发展。不能像某些人所说的,不要提什么“学”不“学”的,要先干出成果。当然,要说译学词典学已经建立,那显然是不合乎事实的,如果说预见其可能建立,作为一个宏大的目标提出,进行一些不无科学基础的思考,从而能够在具体的研究中稳扎稳打,这又有什么不妥呢?空想可能并不是因为不合规律,而是因为走在了实践的前面,某

些条件尚不成熟,但空想往往带有合理的因子,有时导致实际和科学。杜绝空想,也就是杜绝了科学。一个事物,到了条件成熟的时候,你不召唤她,她或许还是羞答答不肯出来。你创造一些条件,辅以扎扎实实的行动,伊便会闪亮登场。

译学词典编纂与研究,是翻译学与词典学相结合的产物,是一门交叉学科,在翻译学和词典学都应有一个位置,是二者迅速发展的一個新的亮点。让我们期待它的健康成长,期待它对翻译学和词典学做出应有的贡献。

著名译学家、北京大学教授辜正坤先生在百忙中为本书作序,鼓励有之,鞭策亦有之,并在文中对译典编研深入论述了自己的理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唐小春、梁晓莉等编辑同志为本书的审稿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一丝不苟,字字认真,让我深受感动,特在此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同时,希望译界的专家、学者对本书慷慨赐教,希望读者朋友予以批评指点,更希望更多的学者、博士、硕士对译典编研发生兴趣,投入到这方崭新的学术天地中来。

孙迎春

2008年3月于山东大学(威海)

翻译学院